

5 集文献纪录片《光明在前》

第三集 《东渡》

解说：

陕北，神泉堡。1947年9月29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佳节。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请战士们一起在院子里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酒、赏月、聊天。

等大家都散了，周恩来回到窑洞中，就着昏暗的灯光，展纸濡笔，给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妻子邓颖超写信。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邓颖超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转移到晋西北。1947年7月，邓颖超从晋西北前往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随后，留在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土改复查工作。

繁重的工作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在信中说：“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看着窗外的圆月，在信的最后，周恩来写道：“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采访：

邓颖超接到了周恩来的来信，当她正在看信的时候，她的秘书进来了，俏皮地对邓颖超说：收到情书了？邓颖超说，哪里什么情书，这是形势报告。眼尖的秘书都看到了信的落款写着“对月怀人”说，还“形势报告”呢，都“对月怀人”了，这不是情书是什么呢？

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牵制胡宗南的任务即将结束，东渡黄河，与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的日子，不远了。

【片名：第三集 东渡】

解说：

在陕北的日子，毛泽东等人留下的照片和影像并不多。这一小段影像，毛泽东、任弼时抽着烟聊着天，周恩来从窑洞中走出来的画面就拍摄于神泉堡，他们的神态显得很轻松。

其实，从1947年9月23日入住神泉堡开始，毛泽东一刻也没闲下来，每天晚上的灯都亮到半夜，有时直到天亮。

毛泽东等人的紧张辛苦，前线将士的拼搏牺牲，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捷报。

1947年10月10日。

这一天，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毛泽东充分考虑着发表后的实际效果，特别在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晋察冀中央局电文中提到，“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中，毛泽东指出，务使全国人民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中国土地纲领》公布后，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地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迅速形成土地热潮。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由此而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

这里是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易家庄。

在这面墙上，隐约还能看出几个大字：中国土地法大纲。

而陈列在各个博物馆中，这张工作人员躬身站在简易桌子上，抄写《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照片，就是这里。

早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委托任弼时多收集、了解和研究各解放区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

1947年10月上旬，任弼时发现10月1日的《晋绥日报》上，以赞赏的口气报道了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群众斗争开明绅士刘少白的情况，甚感吃惊，当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认为土改工作中“左”的倾向正在抬头，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10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分出一部分精力，先后到佳县城和沿黄河畔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解放区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毛泽东帮老乡刨山药蛋，到麦场一起打谷子，又跑到场角去跟娃娃们掰玉米。对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方式、程度以及对土改的态度都作了科学的调研、分析。

在视察佳县县委时，毛泽东题写了这样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这一句话道出的是领袖的心声。

1947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1948年1月，任弼时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

同期：潘敬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我们党有好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那么在指导工作中才少偏差。比如说你先进行调查研究，你走群众路线，然后才制定政策，这样的政策当然容易是正确的。你脱离群众的时候，高高在上，你关在屋子里的政策，那是很容易是错误的。

解说：

就在领袖们奔波于田野乡间的时候，远在华北的晋察冀野战军，正准备发动一场城市攻

坚战。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石门市，1925年由石家庄与休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休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这里是平汉、正太和石德三条铁路的交会点，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第3军从日军手中接管了石门市。晋察冀军区曾多次想夺取石门，但时机一直不成熟。

晋察冀军区指战员军经过一年作战，至1947年8月，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近20万人，收复县城39座，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由杨得志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削弱、钳制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配合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并打破敌我双方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对峙状态，晋察冀野战军积极捕捉战机，于1947年9月上旬发起大清河北战役，随后又抓住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从石家庄孤军北援的有利战机，于10月中旬发动清风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3军主力1.7万余人，俘虏军长罗历戎。

清风店战役后，守备石门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当时仅2.4万余人，且军心不稳，而晋察冀野战军战斗力空前提高。1947年10月22日，聂荣臻等致电中央军委、中央工委，请示攻取石门。次日，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

同期：【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讲解员】

当时电报主要提出了三项重要指示，第一项就是我们要消除疲劳，整顿队势，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第二点我们不但要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第三点尤为重要，就是我们攻打石门，以打援兵姿态来攻打石门。

解说：

这段电文，就是毛泽东的复电。

从内容上，能看到毛泽东对攻取石门的方案、战术、打援等部署指示得非常详细。

采访：温瑞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这个毛泽东是很关注的，一定要做好围城打援的准备，如果说敌人的援军来了，要先放弃攻城，主力进行打援，如果敌人的援兵不来，你再集中兵力攻城，实际上聂荣臻他们也是按毛泽东所说的这么做的。后来国民党的援军没有来，聂荣臻就下令全力攻城了。

解说：

11月6日晨，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总攻，至12日结束，历时6昼夜攻坚战，石门解放，随后石门市改称石家庄市。

石家庄是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战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战役期间的11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前的战局感慨说：“未知前途如何结尾矣”。他不得不供认这是“重要都市的第一次的失陷”，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而11月13日，获悉石家庄解放，毛泽东所拟贺电中，称之为“大胜利”。

采访：温瑞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打下石家庄以后，一可以为我军的城市攻坚作战提供经验，二可以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华北解放区，对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战局的发展还是有相当的意义和作用。

到11月中旬，陕北已开始进入冬季。神泉堡虽然安静，但粮食产量不高，粮食供应问题严重。为了顺利过冬，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住了57天的神泉堡向南行军，前往米脂县的杨家沟。

片 花

解说：

杨家沟的扶风寨，位于一面峭壁上，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城堡式庄园。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进这里，这也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8个月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处。

扶风寨的新院，是一处明五暗四六厢窑的窑洞式四合院，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起居室兼办公室。

此时的全国战场，蒋介石整个部署已完全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的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国民党军队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失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为了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就是在这一间会议室里，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经济纲领。报告还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这显示了党对胜利前途的自信。

采访：温瑞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它的核心。然后派生出很多别的（思想），我们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不要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那么地方的夺取是歼敌的必然结果，所有的策略都贯彻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解说：

毛泽东阐明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经济方面，毛泽东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国人民都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7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本月忧患最深……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蒋介石的“本月忧患最深”，指的是在1947年12月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中原野战军经过浴血奋战，冲破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密集靠拢、向心合击的围攻战术，成功突围，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1948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致刘邓电，“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

1月6日，毛泽东又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罗荣桓电，“庆祝你们1947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面对战争形势图，陷入彷徨之中。他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恐，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1948年的第一个月，不仅国民党军事溃败，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经济也陷入勉强运行的困境，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此起彼伏。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军心民心动摇已极，无人无地无不表现其失败主义之情绪”。

解说：

杨家沟会议结束第七天，1948年1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致信毛泽东，汇报绥德县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意见。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立刻给贺龙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他调查研究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指示将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8年1月15日和22日，邓小平两次致电毛泽东，“在土改中应当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他指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满足贫农要求的政策；但是，在平分土地时，应对地主、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游击区，一个时期内还谈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2月6日，毛泽东致电各解放区，就老区、半老区及新解放区不同地方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意见。其中习仲勋回电中，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毛泽东将这份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邓小平在复电中就如何对待地主、富农、中农政策和发挥贫富农的领导骨干作用问题，提出了全面意见。2月17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从习仲勋、邓小平与毛泽东多次通信中看，土改工作的进展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同期：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实际上国民党也搞土改，1947年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从八月九月这一段时间开全国土地会议。实际上南京方面也有一个土地改革委员会，就是萧铮搞土地方案。

解说：

1947年4月6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协会理事长萧铮起草宣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危机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就会解决我们！”

很早之前，萧铮就专门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调研，亲自拟定《土地改革方案》，但最终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同期：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萧铮在反思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往往方案出来以后下不去，难以执行下去。关键就是蒋介石的政权的基础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让统治者自己拿着刀割自己的肉，刀刃向内是很痛苦的。

解说：

1948年2月24日至3月1日，西北野战军进行宜川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及所属2个整编师5个旅共2.9万余人。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见大势已去，以手榴弹自毙。

胜利的消息传遍陕北，人民奔走相告，杨家沟一片欢腾。

同期：潘敬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为了庆祝宜川大捷，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俩一起走进了扭秧歌的队伍，跟大家一起扭秧歌。当时任弼时他拉起了二胡一起庆祝宜川大捷。这样一个小的细节，一方面反映了军民鱼水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巨大的变化和领导人心中喜悦的心情。

解说：

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此时无论是从西北还是全国形势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坚持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部的使命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能更好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3月21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委合并等。

1948年3月21日，风和日丽，中央机关陆续出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出居住了4个多月的新院，下了扶风寨，经过两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

同期：陕西吴堡县东渡黄河纪念馆讲解员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岔上镇川口村的原子塔渡口。黄河是陕西和山西的分界线，对面就是山西省，毛主席在1948年3月23日下午的一点钟，从这里顺利东渡黄河去了山西

省临县高家塔村。

解说：

时值早春，黄河上的冰凌还没全部消融，老船工薛海玉带领几十个年轻人，和部分中央警卫排的战士一起，提前几天开始渡河训练，使战士们熟悉和了解黄河水性，确保渡河万无一失。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一十七天，行程 1000 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下午 1 时左右，按预先安排，毛泽东登上第一只木船，缓缓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渡船绕过无数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搏斗，顺利到达黄河东岸——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黄河滩头。

同期：石小庆（毛泽东卫士石国瑞之子）

主席那个老青马在另外一个船上，跳下去了，游回去了。大家说老青马怎么又回去了，又说老青马跟陕北有感情，不愿离开，又回去了。王振海管马啊，有那个照片，前面王振海，老是他牵着马，王振海又回去把这个马又给牵回来。

解说：

毛泽东上了岸，回首凝视着黄河和河对岸生活和战斗了 13 年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显然，他的心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

在毛泽东等人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4 月 21 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片 花

解说：

一河之隔，秦晋西东。

山西省临县高家塔村，与对岸的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隔河相望，各修建起一座毛泽东渡黄河的纪念碑。

古老的渡口已经很少见到木制的船只了，只有一艘平板船，在这里偶尔摆渡两岸的路客。在许多老船工口中，当年的渡河往事都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里。

高家塔所在的山西省临县，是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分兵后，于 4 月 11 日，组织以叶剑英、杨尚昆主持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中央及军委的大部分机构来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就驻扎在临县的湫水河两岸。

同期：张海英 山西临县双塔村宣传部主任

在 1947 年的时候，中央后委在临县进驻的地方有 14 个乡镇，70 多个村庄，大部分是沿着湫水河沿岸分布，黄河岸边也有，叶剑英、杨尚昆就住在双塔村。

解说：

到达临县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中央机关住在寨子山村，下榻伊始，便找来村党支部书记和一些老乡进行座谈，了解群众生活、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情况。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等前往中央后委办公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

毛泽东住在了这座小院里。

在同中央后委有关同志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相对于毛泽东的信心百倍，蒋介石却对战局充满沮丧。3月2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然而今日竟无一人矣，奈何”。

毛泽东等只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与中央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和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前往晋绥边区。

周恩来说，这是向胜利进军。

在毛泽东路居双塔村小院西南角，有一个马厩，毛泽东转战陕北所骑的大青马就住在这里。离开双塔村前，毛泽东将大青马交给了准备前往西柏坡的饲养员侯登科，说“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马走吧！”

增加同期采访：

后来在西柏坡的时候，大决战期间，老侯因病去世了。为了不干扰主席工作，就瞒着没告诉主席。老侯追悼会由任弼时主持，朱德还参加并讲了话。有一天，主席说要骑马散散步，卫士就把老侯去世的事告诉了他。毛泽东很生气，一直低头念叨说，老侯病故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最后，他还吩咐让问问老侯家有没有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解说：

新中国成立后，大青马作为军功马，被送到北京动物园精心饲养。随着岁口增大，毛色从青白相间渐渐变成全白色，大青马成了大白马。1962年，大青马老死，被制成标本保存。1964年8月，运回延安革命博物馆，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

兴县蔡家崖村，北依元宝山，南临蔚汾河，是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等乘坐吉普车到达蔡家崖。同晋绥边区领导贺龙、李井泉会面后，当即组织召开会议，听取汇报，除战争情况外，包括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事无巨细；并组织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座谈，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以及如何发动群众等请况。

同期：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过了黄河以后，在晋绥边区蔡家崖，召开五次座谈会，重点强调土地改革中克服“左”的倾向。

同期：潘敬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所以对土改中任何一个小的偏差，毛泽东都在认真地观察着，仔细地思考着。

解说：

晋绥边区司令部大礼堂。

1948年4月1日，贺龙主持召开晋绥干部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吕梁市，有一座晋绥文物史料馆。收藏家郝洪武有这样一件藏品，这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最早单行本之一。在跨越七十多年的油墨字迹中，有这样一个词异常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称号设定和思考的最早版本之一。这表明，在面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和设计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这是一张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油画，画中，毛泽东舒展双臂做拉弓状，表现的正是在蔡家崖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座谈时的场景。

4月2日，在晋绥边区驻地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见面。

《晋绥日报》的前身是1940年9月18日创刊的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1946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是晋绥根据地的战斗号角、抗日旗帜。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一直很关心，它的前身《抗战日报》还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名。

这次谈话是在整个解放区党报史，乃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也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第一次对一家报社的编辑人员发表谈话。

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要求报社的同志“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只有去做去看，去学习，才能了解情况，增长知识，取得发言权。

谈到工作方法时，毛泽东站了起来，双臂舒展开做拉弓状，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这次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指南。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蔡家崖停留了八天。4月4日，他们再次出发，继续向东。光明在前，东方欲晓。